



当代浙学文库
DANGDAI ZHEXUE WENKU

浙学

钱亚梅 著

FENGXIAN SHEHUI DE ZEREN FENPEI CHUTAN

风险社会的责任分配初探



学出版社





当代浙学文库
DANGDAI ZHEXUE WENKU

自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规划一般课题（项目编号：11CBZ210）

风险社会的责任分配初探

钱亚梅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社会的责任分配初探/钱亚梅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309-10181-2

I. 风… II. 钱… III. 风险管理-社会责任-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5453 号

风险社会的责任分配初探

钱亚梅 著

责任编辑/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1.25 字数 209 千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181-2/C · 276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一、选题缘由	1
二、研究综述	5
三、写作思路及方法	16
第一章 风险社会、责任分配与中国	18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	18
一、“风险”这个概念	18
二、“风险社会”解析	21
第二节 风险社会的责任分配	27
一、何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27
二、风险责任如何分配	31
第三节 中国风险社会与责任分配	35
一、中国风险社会的概况	35
二、中国风险责任分配的特殊性	40
第二章 风险社会的政府责任	44
第一节 风险社会的政府责任分配	44
一、政府的责任模式——官僚制反思	44
二、政府责任模式的革新	47
三、政府的风险责任分配	51
第二节 风险社会的决策机制转换	57
一、决策观念更新	57
二、决策结构转型	59
三、决策主体扩充	61
四、决策程序规范	63
第三节 风险社会的国际合作责任	66
一、国家中心主义的局限性	66

二、风险社会的国际合作责任	68
第三章 风险社会的社会责任	72
第一节 非政府组织的公益作用	73
一、非政府组织的由来与发展	73
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与困境	77
三、谋求支持,扩展影响	87
第二节 企业的风险责任能力	92
一、企业分配风险责任的尴尬	92
二、增强企业的风险责任能力	96
第三节 公民的风险责任意识	99
一、公民风险责任意识之淡薄	99
二、公民风险责任意识之亟需	102
三、公民风险责任意识之重塑	105
第四章 风险社会的话语责任	109
第一节 专家系统的风险责任	110
一、专家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110
二、专家系统的风险责任分配	116
第二节 大众传媒的风险责任	125
一、风险传播的模式	125
二、风险传播的“飞去来器”效应	127
三、风险传播的责任	131
第五章 风险社会的发展责任	138
第一节 “有组织的负责任”的现代性	138
一、责任分配的合理性	138
二、责任主体的互信共识	141
第二节 超越资本逻辑,谋求科学发展	144
一、资本逻辑驱动下的风险社会	144
二、风险社会的发展困境	148
三、超越资本逻辑,走向科学发展	151
结束语	155
一、关于现代风险与现代科技的不解情缘	155
二、关于风险社会及其责任分配的三个问题	156
三、关于风险责任研究对当代中国的价值	157
参考文献	160

导 言

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正急速、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和地理边界,从科技、商品、资本、信息及人员等各个方面,展开日益繁密的交往、求索、融合、制约,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依存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和运演过程。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形成了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人类生产发展的经济形态共时为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和悄然来临的知识经济;世界范围内实现着两大文明的转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①。处于如此深刻复杂的时代环境中,曾经有着辉煌历史记忆的中国,在历经了近代一段相对曲折的道路后,正全力奔跑在充满艰险的现代化道路上,西方文明的示范、古老文明的涵育、未来新文明的探索,既是中华文明追求卓越、克服焦虑的内需,也是当今中国迎接机遇、谋求发展的动力。

一、选题缘由

1. 现代性问题的一份思考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当代社会的特征进行描述,如“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经济”等。风险社会理论学者玛丽·道格拉斯(M. Douglas)、尼古拉·卢曼(N. Luhmann)、乌尔里希·贝克(U. Beck)、安东尼·吉登斯(A. 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 Lash)等人则另辟蹊径,从“风险”角度对当代社会的巨变进行了全新解读。在这些风险社会理论学者的论述里,“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一种独特描绘。关注风险与安全可谓人类的永恒主题,应该承认这些学者犀利的思想锋芒为学术进步增添的光彩。但真正使风险社会理论为人知晓,并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研究兴趣的,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频繁发生的一系列地区性甚至世界性的公共安全事故,如切尔诺贝利核

^① 朱厚泽:《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炎黄春秋》2010 年第 6 期。

泄漏事故(及至日本核泄漏事故)、9·11恐怖袭击事件、疯牛病、“非典”、禽流感、欧美一些国家先后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故、甲流、海湾漏油事件等。这些事件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沉痛灾难的同时,也给现代文明的发展图景敲响了警钟,进而使得风险社会理论逐渐成为学者观察当代社会与反思文明扩展的新视域。

在风险社会理论学者看来,工业社会以来的现代风险是人类行为意义上的结果,它在某种程度上标示着“自然和传统的终结”。“夸张地说,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①在这里,所谓“自然的终结”,意指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改变了,自然环境不再以“不可知”、“不可控制”的方式设定人类的命运,相反,它受到了人类社会化的入侵和终结。所谓“传统的终结”,意指作为传统的约束模式——规范制约和道德内化逐渐被“个人理性主义”和“法理化”的现代约束模式取代。在自然和传统终结后的世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转移^②。从这层意义上看,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异。“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③风险内在于人类“拓殖未来”的愿望和通过知识、技术进步谋求幸福的过程之中,它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

本书的写作动机直接来源于风险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具体来说,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制度高度发达,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在风险社会来临时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长期以来以物质财富增长为发展的评价标准,使人们高歌科技理性,崇尚“消费主义”,而政策制定者、法人公司、专家、媒体所结成的精英联盟,则凭借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其所导控的话语体系来推卸、转嫁责任,屡屡让全社会共同分摊风险,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漫长的现代性全球扩展过程中无影无形而成。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以来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种种制度机制的运转失灵现象,表现为风险的制度化不断向制度化风险转变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滥用权利,漠视责任,将自身置于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方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① 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主张把风险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人造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前者是指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自然的不确定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如地震、洪水等;后者是指我们在以一种反思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行动框架中要积极面对的风险,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如核泄漏、全球变暖等。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③ 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8页。

泉。换言之,这个关涉制度伦理与环境伦理的问题,既反映了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同时也彰显了传统的发展模式使人类生存环境在今天面临着巨大威胁。

2. 中国现代化征程科学和谐发展的一种理论探索

尽管关于风险责任的理论分析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但事实上,现代风险在发展中国家积聚得更快,因为对于贫穷地区的人而言,化工厂里错综复杂的管道和箱罐就是现代化的象征。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是谋求现代化的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只要在国家和社会中明确的物质需要——‘短缺的专制’——还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突就占据着历史的前台。”^①发展中国家还面临自身特有的风险——社会转型的制度、结构多重风险。当代中国便是典型一例。

中国现代化征程伴随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启动而加速前进,在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演进过程中,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民幸福指数的各方力量明显呈现复杂化、不确定性之特征。然而,深化改革、稳步发展的客观内需同样也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样的时代风云际会中,学者们所研讨的“现代风险”、“风险社会”、“风险责任”话语,事实上也不妨视作官方话语中的“和谐社会”探求之另一通幽曲径。而且“风险”话语会给人们在视觉和心理上带来更多的危机意识和紧张感,从而能更好地增强人们革新传统、开创新世界的源动力。

当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处境和阶段,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以自身相对脆弱的现代制度结构为基础,既面临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发展风险,又面临着全球化进程里的外来与本土风险的重组问题,还面临着资本拓展所需的能源供应、环境承载及人力资源这些瓶颈因素的风险考验,而且,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不断被消解,现代的、积极的社会资本没有得到有效建构,社会信任结构十分脆弱。比如,人们在灾难面前,很容易出现过度信任他人或怀疑他人的极端,因此各种传言、谣言往往会出现在风险威胁之际。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几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期产生、逐步应对的风险问题,在中国社会仅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进程里非常集中地呈现出来。因此,我国相当多的专家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高风险社会”。

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学者看来,传统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在后工业社会中已遭遇强劲挑战,为挽救国家官僚机制的合法性地位,需要“再造政治”以重新分配风险责任;但是,对于正奔向现代化路途的当代中国而言,在借鉴西方国家风险管理经验并革新传统风险管理体制的同时,却还要努力避免重陷西方的制度困境,这无疑极其艰巨的重任。当然,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社会主义中国在文化传统、基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6 页。

本制度价值与发展理念上有着不同于自发现代化国家的特点与优势。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避风险、求和谐”的理性目标,“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等,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理念,成为当代中国进行现代性选择和创新的前提。

当代中国为打造“和谐社会”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和调整,有助于应对快速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各种社会风险问题。因此,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不论是要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还是要建构一个利于自身健康发展的“有组织的负责任”的现代性体制,都应该把风险责任的切实分配视为其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

3.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个新视野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形成并付诸人类社会实践以来,历经曲折与诘责,其间不乏各种有失偏颇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和实践尝试,如在极“左”、极“右”、教条化、功利化、虚无化诸思潮影响下,形形色色“马克思主义”的登场。然而,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延绵至今,其旺盛的生命力确实值得人们驻足反思。或许,在某种深层意蕴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发展理想蓝图的钟情,契合了人类自远古以来从未停息的对于理想社会的孜孜探求精神——“理想国”、“太阳城”、“乌托邦”、“大同世界”、“太平天国”……五彩缤纷,形异意同。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以争取人的自由与解放为终极关怀,以追求人类幸福为崇高目标,主张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这些具有普世关怀的价值理念,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时具有激励人们为之奋斗的作用,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随着人类生存危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危机)的不断出现和加剧,人们愈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为之奋斗的重要性和长期性。

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印证、检验也愈益使人们明晓,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得以维系的关键途径在于时代化。每个时代都有其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其具体任务和各种流派源于各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源于时代对于理论的诉求。可以说,没有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生命力和巨大历史助力。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曾深刻预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因此,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就延展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线和脉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现代化的各种发展特性所做出的许多论断,就成为今天的学者们探究质疑的理论源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盛世中的危机关注尤其是学人的使命。现代文明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类在这一文明形态诞生之际便播下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念,足见其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理想的殷切与诚挚。虽然成绩斐然,发展进步依然是时代的主旋律。但我们也不能不关注到,现代文明日益发达,现代风险似乎也成为其副产品而如影随形。时至今日,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弊端与可持续性令人倍感焦灼的一面,如发展失衡、贫富分化、人口膨胀、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科技力量有限、国家利益纷争、民族文化差异、资本张扬、劳动异化、个体“物化”、价值观“无核化”、道德责任感失落等,都是迫切需要回应的重大问题,客观上也催促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工程,当然,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惟其如此。历史经验还提醒人们,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取得一系列成功之后。曾执政七十四年、在短短几十年内创造了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苏联共产党的轰然倒台,曾连续执政七十一年、带领墨西哥人民创造了国家统一、政治安定和经济腾飞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被取代,类似的大党、老党接二连三地失去执政地位的事件,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人们容易在巨大成就面前缺乏危机意识,失去创新热情,忽视对自身缺点的纠正,或者以曾经取得的成就来淡化失误。在我国,虽然马克思主义居于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及其影响也不容忽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我国的法定执政党,但近年来关于党建的危机意识我们也深切有感,从十七届四中全会会议报告中就可略窥一斑:“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达成这样的共识,足见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多元思想文化的严峻挑战。探究这种严峻挑战背后的风险因子、责任缺失或错置的缘由,以及克服之道,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个着眼点。

可以预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工程将在一个全新的更为复杂的现实和历史条件下展开,只有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气魄,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才可能统领国内多元思潮和文化的发展。尽管理论探求有时候很难完满解答纷繁芜杂的现实处境问题,但是无论现代文明的步伐如何推演,不断实现和提升人自身的解放与自由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关键议题,理论憧憬“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它值得世代的人们去探求。由此,风险社会语境下的责任(其另一面即为生存发展权利)分配问题便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一个新视野。

二、研究综述

应该承认,学术界对现代风险的特点、成因、影响问题及风险社会的治理、分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正义、责任分担等议题的关注度近十年来大幅提升了,但是专论风险社会的责任分配问题的论著尚不够丰富,故这里仅就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概貌、中国风险社会研究状况以及风险责任问题的研究动态作一述评。

1. 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概貌

关于社会风险的社会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而风险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主流话语则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事情。尽管时间较短,但其发展十分迅速,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广泛,如哲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播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还涉及许多焦点议题,如风险与科技、风险与环境、风险与政治、风险与传媒、风险与伦理、风险与公众、风险与信任、风险与社会不平等、风险与分配正义之间的关联。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玛丽·道格拉斯、斯科特·拉什、威尔德韦斯、沃特·阿赫特贝格、约瑟夫·休伯、莫里斯·J·科恩、弗兰克·费希尔等西方学者具体从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再造政治、启蒙风险意识、风险文化、审议民主政治、生态现代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思考和探索。

学者研究风险社会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其一,现代风险是建构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换言之,风险是由政府、企业、学者和公民团体等建构起来的,还是在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其二,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是何关系?既然风险社会从工业社会成长而来,是工业社会的副产品,那么,风险社会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吗?其三,现代化的阶段与形态问题——现代化可分为几个阶段?西方社会工业化形态是现代化的标准形态吗?其四,风险社会还是阶级社会吗?其五,人类将要面临的到底是风险社会时代,还是风险文化时代?

2. 中国风险社会的研究述评

(1) 现代风险在中国的主要特点和表现形式;中国风险的形成原因;发展与风险的关系;风险意识与风险规避等一系列问题的总体研究状况。

第一,在风险的主要特点及表现形式上,中外不少学者均认为现代风险在中国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特性,中国风险社会堪称一个“高风险社会”^①,历时态风险与共时态风险,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风险俱存。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其中,信任风险将会是主要的部分^②。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的“高风险社会”,在读词断句上不妨视为“高风险”——“社会”,即含有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状况量化描述之意。故也有学者指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表现为量大、面广、度深的“风险并发症”形式,社会风险呈现出多重复合、交叉并存、积聚增生、复杂多变等特点,突出表现在新旧矛盾聚焦、国际

① 李路路:《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和国内问题交织、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风险并存这三个方面^①。

第二,在风险的成因上,大多数学者认为现代风险在中国具有独特的成因。其中,具有双重性的社会转型是重要原因,即发展方式的转型与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形塑的转型社会风险。此外,还包括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合拍、经济发展模式、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政府能力和利益追求等因素^②。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内生机制和深层根源,学者一度做出这样的图式:权力高度集中→民主法制不健全→权力失约、权力失监、权力失衡→各种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公共安全问题等→分配不公加重、道德底线不保、诚信缺失等→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化→经济和金融风险增加。他们还强调了这一图式所反映的只是现阶段社会风险的内生状况,它并非固定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阶段性的转换,社会风险的内生机制及其彼此间的因果关系会发生改变^③。

第三,在发展与风险的关系上,学界与官方意见相似,基本都认为中国社会的中轴仍然是发展。风险社会的中轴理论是分配风险,而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生存,这使得中国社会的主轴仍然是发展问题。虽然“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④的断言至今还令人心存不安,但是,告别传统走向现代已经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在打开国门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人们还是愿意相信“现代性是复杂的,是线性逻辑与非线性逻辑、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具体历史辩证统一;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同时,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一个可以认识的、有规律的客观历史过程。面对复杂现代性的诸多问题,需要强化辩证思维、规律意识,以把握现代性的具体规律为基础,构建合理的发展伦理策略,推进现代性的不断合理化”^⑤。

第四,在风险意识和风险规避能力上,中国学者基本都认为中国社会的应对机制亟待加强。具体表现在:民众风险意识淡薄;城市规避风险能力较弱;专家系统尚未能在公共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大众传媒对风险环境的监测、沟通和平抑社会公众心理的能力还很不成熟;社会信任体系危机重重,不利于风险防范与规避;政府职能转换过程中责任的错位与缺失不但不利于处置风险,反而可能助长风险的肆虐。“时至今日,无论是针对自然灾害的危险、经济领域的概率风险还是科学技术的伤害后果,中国社会依然在用一种传统的应急处置的方法对待。”^⑥李瑞昌

① 左亚文:《当今中国社会风险的哲学透视》(上/下),《理论探讨》2012年第2—3期。

② 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4期。

③ 左亚文:《当今中国社会风险的哲学透视》(上/下),《理论探讨》2012年第2—3期。

④ 亨廷顿曾指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41页。

⑤ 陈忠:《风险社会与发展伦理的辩证逻辑》,《东岳论丛》2009年第5期。

⑥ 李瑞昌:《风险社会的政治挑战》,《文化纵横》2012年第5期。

从“利益蒙蔽、因果模糊和反思缺失”三个方面深刻地分析了风险认知和规避上的痼疾。

(2) 在中国风险社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研究方法上,我国学界从早期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翻译、引进、描述,逐渐转向评价、反思及联系中国实际提出应对策略的阶段。

我国近几年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论著,为学者们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带动了国内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相关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学者们还结合我国当代社会风险问题,开展了适量的实证研究,并纷纷提出规避风险、分担责任的各家办法。其中有代表意义的主要有:宋林飞在《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1999)中,提出了建立“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郑杭生、洪大用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及对策》(2004)中,提出转型期中国社会潜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具体表现为多重风险共生、社会自身在保障安全方面尚显脆弱、应对风险的思维具有极端化倾向等,同时提出了建立更加安全的社会的对策及建议;杨雪冬在《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2006)中,选择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其著作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框架,运用许多典型案例检讨了风险对我国现有制度的冲击和挑战以及我国在应对风险上所存在的问题与秩序缺陷,着重分析了风险与秩序的关系,并讨论了风险社会中秩序重建的可能性;邓正来、沈国麟在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风险社会与中国》(2010)中,就风险社会的全球化特征、阶级社会的理论分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追寻路径、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方法论国家主义还是方法论西方主义)进行了诚挚坦率的探讨;等等。

从方法论角度看,西方理论如何本土化和中国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今天困扰学界的问题是:“本土化和中国化在一定程度已经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所有人都可以用以拒绝各种外来理论和概念的武器。……事实上,对外来概念之生产背景及其内涵的还原性努力,始终是我们建构研究本土社会的参照系的工作的一部分。”^①确实,要求本土化和中国化本身无错,但如果演绎到意识形态或者极其抽象的境界,不仅无助于甚至有害于理论的经验化和存在意义,而且会妨碍人们的思维。因为引进、学习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原本就是希望能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某种参照、镜鉴或警示,哪怕这份希望最终落空。应当通过学习了解外来理论及其实践生长状况,对本土的社会特殊性与知识背景作切实的解读,开展条分缕析的对比,以探异同,确定其对本土研究的具体价值。

当然,大多数学者研究风险社会理论、思考中国风险社会的问题时,是以开放的思维从积极的方面着眼的。比如,有的学者结合20世纪末苏东剧变的现实,提

^① 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4期。

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更加复杂化的今天,需要重视防范源自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风险^①。有的学者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细致展现现代风险在福岛核泄漏事故中的表现、特点以及应急机制的社会过程,结合福岛核泄漏事故后世界范围内关于核电站未来发展的存废之争,联系中国国情,提出保证风险信息公开、鼓励风险中公众参与、建立政民心理契约等政策建议^②。还有学者建议探索“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在各国政府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如预警灾害通报)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学者们还联系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大胆突破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参照复杂性社会理论的视野,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中走出来,强调政治革新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多层次合作,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参与,强调政治和道德对经济、科技发展的引导,从而使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更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更多学者从风险社会视角研究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对策主张。有学者立足于风险社会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启蒙意义,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防范重大社会风险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的对策建议;有学者详细探讨了中国社会风险的源起、传递、分配与承担,指出转变旧有的社会治理思路、建立适应风险社会的新型风险管理体制迫在眉睫;有学者则从危机管理实务出发,探讨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建设和政府的政策风险防范能力建设;还有学者通过反思我国现有社会政策、社会保障(救助)制度的不足,提出了强化弱势群体风险管理的若干政策建议;等等。

3. 风险责任问题的研究动态

生态环境的破坏、能源资源的危机、人际冲突、社会心理失衡、主体性地位的张扬与丧失……对于这样的现代性发展图景,以贝克为代表的学者深刻地指出,这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机制带来的问题。在贝克看来,首先要进行风险意识的启蒙,它区别于工业社会的启蒙,是所谓“第二次启蒙”,即从人性角度去审视当代风险问题及其出路;其次要探索生态民主政治路径,依靠非政府组织的切实行动及其环保运动来彰显“负责任的现代性”,即“第二现代性”;再次要以政治和道德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大力提倡弥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鸿沟,使科学技术实践与政治道德实践相统一。吉登斯强调以“生态政治”、“生活政治”的策略,反思现代化自身,在不断重建传统的历史发展中获取化解当代社会风险的文化资源,以此来校正现代性的发展方向,以免误入歧途,即“以现代性对抗现代性”。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则提倡用诸如环境保护运动、绿色运动之类的亚政治运动去防范和

① 丁祥艳:《从风险社会视域论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人民论坛》2012年第17期。

② 谭爽、胡象明:《特殊重大工程项目的风险社会放大效应及启示——以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为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化解风险。沃特·阿赫特贝格认为,如果风险社会将要成功地迎接其自身带来的道义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挑战的话,就亟需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审议民主政治。约瑟夫·休伯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他从理性上勾画了解决当前社会追求物质消费和工业生产所造成的生态失衡问题的战略。莫里斯·J·科恩把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和休伯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内,分析了风险社会与生态现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他认为,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承受着生态危机和科技风险的现实威胁,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状态下,社会冲突将会变得更加突出。弗兰克·费希尔从风险意识与责任入手,详细陈述了环境学专家与计量学专家的政见,提出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风险社会理论中关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概念。

在中国,学者们的关注点从最初的风险分配正义问题逐渐细化追责到社会控制体系的各种领域,如政府责任、政治责任、非政府组织责任、企业责任、传媒责任、专家责任、发展责任乃至公民个体责任等。一个成熟的社会,应有一套能够应对风险挑战的机制。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濒临失效,新的控制体系尚未建立起来。“面对现代化发展的这一挑战,反思人类的行为,我们应加强责任伦理的建设,强调社会各主体伦理责任的承担,使之真正能够调节并规范主体行为发展的方向,为风险社会中人类的发展提供疗救机制。”^①

其中,政府责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心,近年来学界著述颇丰。借助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从对转型期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探讨一直到中国的国际责任分担问题,学者们深入讨论了现代风险考验下的政治合法性、政治信任、民主政治、统一战线中的政协作用、政策责任、威权体制、有限政府、效能政府、弹性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举措及福利国家的利弊等问题。有学者指出,对于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政府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诸多防不胜防的公共危机,然而,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形态下,政府垄断了绝大多数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包揽了过多的职能,随着“中国一注意力社会”(attentional society)的到来,以及从改革开放前的威权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将面临陷入“重责政府”的困境。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定位政府的角色,是政府摆脱自身困境的必由之路^②。有学者认为,现代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既具有恒定性的一面,也具有流变性的一面。其恒定性在于,任何现代政治系统都只有顺乎民众诉求,为民众满足其最根本的利益需要创造有效的条件,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其流变性在于,现代政治系统必须敏感于民众利益需要的变化。当前我国的政治系统面临双重的合法性挑战。党和政府应在建设一个更加富

① 刘婧:《风险社会与责任伦理》,《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6期。

② 杨建成、纪权凌:《风险社会与“重责政府”困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裕的社会的同时,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社会。只有在满足民众的物质需要的同时满足其安全需要,创造有利的条件和提供有效的保障,党和政府才能在巩固旧有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拓展新的合法性基础^①。有学者强调,当今中国,发展源于改革,风险也源于改革,发展源自改革对于束缚人的旧的体制的破除,风险则源自改革的不平衡和不彻底所导致的问题和矛盾的扩散和激化。这是由中国社会风险的生成机制和本质根源决定的独特属性^②。有学者认为,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在于:中国现行的社会管理制度本身成为当下中国矛盾凸显期的风险源,社会管理“内卷化”现象的愈益凸显将带来社会矛盾深层次的累积和爆发,风险责任主体的模糊和缺失使社会管理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成为常态。因此,需要重塑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构建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创建新型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③。有学者指出,面对转型期因社会信任缺失而导致失信文化弥散,因公民意识觉醒而引发维权事件增多,因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等一系列挑战,以及网络民意及公共舆论事件的发展,只有不断提高自身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的能力,才能在化解种种社会风险中巩固和提高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④。有学者主张,“国际责任”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和矛盾的概念,应慎重使用“负责任大国”、“大国责任”及“国际责任”等概念。相比之下,采用“国际贡献”和“国际共同责任”等说法更为恰当^⑤。

在20世纪中后期的全球治理中,“异军突起”的非政府组织在减少和消除贫困、治理气候变化与温室效应、保护环境、消除妇女歧视等全球性议题上,对国际事务施加的影响越来越深广。然而,伴随着全球政治图景的变化,非政府组织面临代表性、合法性、身份认同等方面越来越多的政治诘难。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各类不当行为招致更多诘责,如资金滥用和腐败、筹资或游说中的不诚实、对易受损人群滥用权力、信息不透明、较差的管理和治理水平、提供服务上的失败、过度商业化等。在强大的全球性风险考验下,非政府组织需要构建一种既能够遵循组织宗旨和使命,又能在变动的环境下有效平衡各利益相关方多元价值偏好的平衡式问责。因此,非政府组织问责可以被归入政治问责、法律问责、管理问责和伦理问责四个维度。一般而言,非政府组织问责方式主要包括报告和信息公开、绩效评估、社会监督、参与、自律^⑥。学者们从危机管理、心理干预方面探讨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① 姚伟:《风险社会来临与政治系统合法性问题》,《长江论坛》2012年第2期。

② 左亚文:《当今中国社会风险的哲学透视》(上/下),《理论探讨》2012年第2—3期。

③ 徐艳玲、赵萍:《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与出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

④ 柯红波:《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行政论坛》2013年第3期。

⑤ 李东燕:《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

⑥ 龙宁丽:《非政府组织治理中的问责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4期。

指出非政府组织因其专业的服务、充足的人才储备、丰富的科研成果及广泛的国际合作,能够成为协助政府主导应急工作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①。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特征和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危机治理中具有机制、服务、理念、专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能够在危机前预防、危机时决策、危机中救援及危机后重建等各个环节发挥独特作用^②。针对社会转型期因利益分化所致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现象,有学者认为,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和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成为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的可生力量^③。有学者研究了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表现,认为非政府组织始终都是当前和未来气候谈判格局的一个影响力来源,中国在设计国际气候谈判战略、战术过程中,应重新定位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并有效运用其在谈判过程中的影响力^④。

学者们对专家系统在风险社会的处境进行了颇深入的探讨。有学者以前南斯拉夫和苏联为例,剖析了技术创新在当代社会的双刃剑意义,认为技术专家体制的哲学是一种缺乏社会责任的哲学。而一种批判的社会哲学既要为技术进步提供各种可能,又要铭记技术考量最终必须服从于人道主义考量^⑤。有学者以布雷耶的《粉碎邪恶循环:面向有效率的风险规制》一书为例,指出我国风险规制存在着与美国政府相似的问题,而布雷耶法官所提出的“超级专家理性”制度切中了我国风险规制体系的要害,因此,这项制度对于破解我国风险规制所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⑥。有学者在探讨了专家知识的社会行动属性以及公共决策的技术—政治过程的基础上,从专家体制的视角揭示了“专家知识与政治决策”关系的社会学特征^⑦,并进一步研究了专家体制所面临的困境,揭示出其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需要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

① 曹蓉、刘奕:《国外应急管理心理干预中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作用探析》,《未来与发展》2012年第11期。

② 李丹:《全球危机治理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与作用》,《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③ 彭晓伟:《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④ 侯佳儒、王倩:《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非政府组织:地位、影响及其困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⑤ [前南]米哈依诺·马尔科维奇:《当代社会中的技术专家体制和技术创新》,曲跃厚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

⑥ 杨小敏、戚建刚:《风险规制与专家理性——评布雷耶的〈粉碎邪恶循环:面向有效率的风险规制〉》,《现代法学》2009年第6期。

⑦ 赵万里、李艳红:《专家体制与公共决策的技术—政治过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11期。